

華人世界 的現代國家結構

江宜樺、李強 = 主編

台灣研究基金會 = 策劃

民主政治

自由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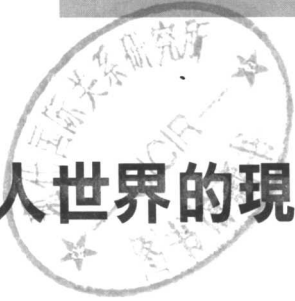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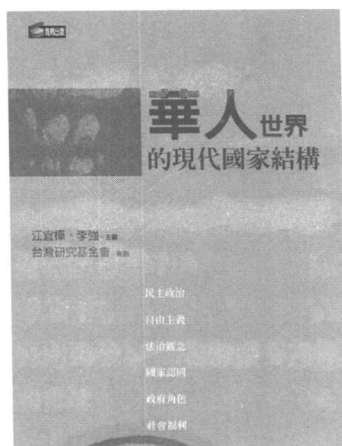
法治觀念

國家認同

政府角色

社會福利

1112
E32
947
S
111
E22
947



華人社會的現代國家結構

AYAJ76/01

HS 200 三年三月九日

江宜樺、李強 主編
台灣研究基金會 策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臺灣研究基金會作。--初版。--臺北市：商周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3[民92]

面：公分。--（Discourse：2）

ISBN 986-7747-38-0（平裝）

1. 政治－中國－論文，講詞等 2. 民主政治－臺灣－論文，講詞等

573.07

92001799

DISCOURSE 2

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

主 編 / 江宜樺、李強
策 劃 / 臺灣研究基金會
副 總 編 輯 / 林宏濤
責 任 編 輯 / 陳玳妮

發 行 人 / 何飛鵬
法 律 顧 問 / 中天國際法律事務所周奇杉律師
出 版 / 商周出版
100 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6樓
電話：(02) 23587668 傳真：(02)23419479
E-mail：bwp.service@cite.com.tw

發 行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4樓
電話：(02) 23965698 傳真：(02) 23570954
割撥：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讀書花園網址：www.cite.com.tw
email: service@cite.com.tw

香 港 發 行 所 /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 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新 馬 發 行 所 / 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email: citekl@cite.com.tw
電話：603-2060833 傳真：603-2060633

封 面 設 計 / 楊啓巽
打 字 排 版 / 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印 刷 / 聯雲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 / 農學社
電話：(02)29178022 傳真：(02)29156275

■2003年3月10日 初版

售價 / 360元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黃煌雄

台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

台灣研究基金會是一個以熱愛鄉土、關懷台灣的知識份子與年輕企業家為主體所成立的公益性組織。自一九八八年成立以來，我們就以促進台灣的常態化及國際化為目標，試圖為國家社會略盡棉薄之力。台灣研究基金會所舉辦的活動，無論是演講、座談、研討會或出版系列叢書，都希望有助於增進國人對現況的了解，有助於盡快結束非常時期的體制與法令，有助於早日將台灣當作常態社會來做更科學、更美好，更有遠景的規劃。我們的資源雖然有限，我們的誠意卻綿綿不絕。希望我們的拋磚引玉能開風氣之先，進而導致更大的關切，匯集更多的資源，結合龐大的力量，促使我們的社會早日真正走上常態之路。

自一九九七年開始，台灣研究基金會將活動的觸角伸進國際社會。我們先後與美國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心、亞洲中心共同主辦以兩岸為主題的學術會議，討論過的題目包括兩岸的「基層選舉」、「黨國體制」、「民族主義」、以及「社會運動」。這些會議分別邀請來自大陸的及台灣的學者參加，經由這些會議，不僅增加兩岸交流的深度與廣度，也豐富了對兩岸的思維與視線。哈佛大學的這個學術活動系列比較偏向政治制度與公共政策的分析，因此我們從二〇〇二年開始，也跟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亞洲研究中心合作，舉辦一個同樣是討論兩岸議題，但偏重規範性理論的學術研討會。我們希望藉由這些活動，兩岸的知識份子能夠充分交流，並引起國際學術界對兩岸議題的重視。

二〇〇二年的會議從二〇〇〇年就開始籌備。我們先與英國倫敦

政經學院（LSE）亞洲研究中心的胡笙博士（Dr. Athar Hussain）聯繫，他立即表達樂於合作的積極態度。接著我們邀請曾國祥、江宜樺、蔡英文、蕭高彥等教授討論，確立了會議的主題及邀請人選。隨後我們請曾國祥博士負責與胡笙博士進行行政聯繫，請江宜樺教授及北大的李強教授分別負責聯絡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撰稿人。經過大家的共同合作，會議如期在二〇〇二年五月十日至十二日召開。會中除了有來自台灣及中國大陸的學者外，也包括倫敦政經學院所邀請的英國學者及其他海外學者，總共發表十八篇論文，出席人數在數十人以上，堪稱一次成功的學術會議。

會議結束之後，基金會委請江宜樺教授與李強教授繼續負責會議論文的編輯出版工作。為了使專書有更集中的焦點，我們從會議論文中選取了十三篇文章（含台灣部份七篇、中國部份六篇），請作者改寫成中文。其中楊大利教授、Cabestan教授、張樂因教授的英文稿因不便親自改寫，乃委請黃俊龍、童涵浦、鄭義愷等三位先生翻譯成中文，再由作者校正成稿。

此次會議能順利舉辦，會後專書能順利出版，台灣研究基金會要特別感謝LSE的胡笙博士、休斯博士（Dr. Chris Hughes），台灣的曾國祥博士、江宜樺博士，以及中國大陸的李強博士。當然，我們也要感謝所有參與這次會議的論文發表人、評論人、主持人、工作人員、翻譯人員，以及商周出版社的協助出版。希望類似的學術活動，將來能夠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使活動發揮更大的效果。

二〇〇二年

「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

國際學術會議開幕致詞

黃煌雄

Dr. Hughes，各位貴賓：

今天，非常高興，也很榮幸，能在這裡與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共同主辦「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國際會議，這也是台灣研究基金會第一次與英國的著名大學合作舉辦以華人世界為主題的學術會議。

從一九九七年起，台研會曾連續四年與美國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心、亞洲中心共同主辦以兩岸為主題的學術會議，討論過的題目，包括兩岸的「基層選舉」、「黨國體制」、「民族主義」、以及「社會運動」。這些會議分別邀請來自大陸的及台灣的學者參加，經由這些會議，不僅增加兩岸交流的深度與廣度，也豐富了對兩岸的思維與視線。

在哈佛大學舉辦的兩岸會議，議題雖然是現實的，但卻更從歷史與學術的角度來探討，這也是多年來我們一直謹慎堅持的原則。今天，在倫敦政經學院所舉行的這次會議，相對於哈佛大學所舉行過的，題目毋寧是更思想、更觀念、更制度的。由於歐洲，特別是英國，是人類文明最重要的發源地之一，至今已發展成為普世價值的不

少思想、觀念、制度等，均源於歐洲。因此，我們認為，能在像倫敦政經學院這樣產生過如：拉斯基（Harold Laski）、波普爾（Karl Popper）、歐克秀（Michael Oakeshott）、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以及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偉大思想家的大學，邀請到歐洲學者以及兩岸學者，共同探討「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實在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也是一件非常有助於兩岸思考的會議。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的參與者，特別要向大陸方面的聯絡人李強博士以及台灣方面的聯絡人江宜樺博士及曾國祥博士致謝，尤其要向本次會議的關鍵人物胡笙博士致謝。沒有他們的努力，這次會議是無法舉行的。正如Lord Desai主席在倫敦政經學院的晚宴上所說，我也希望倫敦政經學院和台研會這種學術上的合作，不僅能繼續下去，未來甚至在更多的領域上，也能共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導 論

江宜樺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現代國家結構是一個重大而複雜的課題。「現代」並不單指我們目前生存其中的時間段落，還意味著某些特定的象徵、性質及條件。當前所有人都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初期，但並不是人人都過著「現代」的生活。在這裡，「現代」意謂的是某種經濟狀況（譬如工業生產及自由貿易）、政治組織（譬如主權國家、政黨政治）及社會結構（譬如核心家庭、大眾文化）的綜合特徵。「現代」雖然與「傳統」相對立，但「現代」絕非僅具有時間點上的意義，而是一組特定象徵、性質及條件的總稱。

「現代國家結構」所代表的是人類集體生活在「現代性」（modernity）之中的展現。在尚未「現代化」的地方，人類政治組織可能維持宗長獨斷、政教合一、權力集中的樣態，但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政治結構則要求尊重人民意志、政教分離、權力分立制衡。尚未「現代化」的經濟生活，可以維持以物易物的市集型態，但「現代國家」的經濟結構則預設貨幣流通、資本信用、產權保障、開放市場等制度。其他像是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也莫不有其現代性的特徵屬性。如何使自己生存的狀況早日變成「現代國家結構」，似乎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當然，海峽兩岸的華人也不例外。

本書以「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為題，就是為了探討兩岸華人所建立的國家，是如何轉型為具備現代國家結構特質的政治共同體。這個課題所牽涉的層面極為複雜，遠非本書所收集的十三篇文章所能窮盡。但是本書的作者們，仍然努力地從某些最重要的層面下手，希望替兩岸華人的政治實踐，找出某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觀

點，以作為未來我們繼續探索現代國家結構時的參考。具體而言，本書關注的焦點包括：民主政治如何建立？自由主義經歷何種發展？法治觀念如何落實？國家認同如何確立？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角色多重？社會福利水平應如何分析？等等。在籌辦會議初期，我們原本希望所有議題都能邀請到台灣及中國大陸的學者各一位，分別反省兩岸的相關經驗並形成建設性的對話。然而開始進行之後，發現某些議題無法適時找到適當的人選，因此最後所收集文章中，有些並沒有形成兩兩對應的情況。不過，即使就兩岸分別的現代國家結構來看，本書的文章已相當整齊。細心一點的讀者，甚至可以從前後兩部份的安排，看出具有對比意義的地方。

在討論台灣的現代國家結構方面，本書共收入七篇文章，分別是蔡英文（討論台灣民主理念的發展及其問題）、江宜樺（討論台灣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其遭遇的理論對手）、曾國祥及許家豪（從保守主義的角度反省台灣的法治困境）、蕭高彥（分析國家認同問題的理論意義）、徐振國（討論行會及工商團體在中華民國國家建立過程中的演變及影響）、古允文及劉育廷（分析台灣民主化運動與社會福利支出之間的關係）、陳添枝（討論兩岸加入WTO之後貿易關係的可能發展）。以下我們簡單摘述這七篇文章的內容或論旨。

蔡英文的文章嘗試從觀念史的角度切入，分析台灣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民主理念的發展及其問題。他認為「自由憲政」（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與「民眾民主」（popular democracy）是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兩大意識形態資源。這兩種民主理念的共同目標在於批判與對抗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威權體制，但是在策略的運用上，自由憲政主義者採取「體制內改革」的途徑，試圖透過民主議論的批判，轉化威權體制的獨裁性格，使之變成依法而治的民主制度。相對而言，「民眾民主」的理念則具體落實在黨外民主運動，倡議此理念的黨外領導菁英試圖透過這種意識形態，動員廣大民眾的民主自覺，並凝聚人民的行動意

志，從「體制外」的抗議運動，顛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體制。一九五〇年代的《自由中國》堪稱追求「自由憲政」理想的代表，但是自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民眾民主」的意識形態逐步主導著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進程。其結果固然提升了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主體性，但也帶來了複雜難解的族群衝突問題。

針對「自由憲政」與「民眾民主」的理念，台灣也出現了兩種回應民主化運動的意識形態，蔡英文分別稱之為文化保守主義與政治保守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雖具不同的內涵，但同時關切民主制度落實所需要的社會經濟與文化條件。文化保守主義以一九六〇年代形成的「新儒家」為代表，而政治的保守主義則是指一九八〇年代某些台灣政治與社會學者將美國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應用於台灣民主化的反思批判。這兩種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以不同的方式質疑民主化的進展，並間接合理化了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不過，目前台灣民主發展的主要問題並不是保守主義的阻擾，而是根源於國家定位曖昧所引起的爭論。蔡英文認為：如果台灣的族群問題源出民主之普遍性理念的具體落實，以及來自民主的抗爭，那麼公民德性的培育與民主憲政的共識應該是緩解此衝突的對策。但是，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地位僅具有「中介性國家」與「另類主權」的性格，尚未構成完整的主權國家，這個特性為台灣的進一步民主化造成了複雜的難題。

江宜樺的文章討論台灣自由主義形成的背景、發展的階段、以及它與其他意識形態的爭論。他認為過去五十多年裡，對台灣自由主義構成有力挑戰的意識形態包括文化保守主義、社會主義、國族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爭論的焦點在於中國文化究竟有沒有自由主義的元素，以及「自由」究竟應該指涉內在自由還是外在自由。自由主義者的立場是中國文化沒有近代自由主義的要素，必須虛心向西方學習外在自由（權利）的保障。社會主義在台灣勢力薄弱，不足以形成歐美社會常見的左翼傳統。但是由於中國政治

思想傳統強調「均平」的理想，因此無論在社會主義陣營或非社會主義陣營中，都有許多支持「經濟平等」、「社會正義」理念的人。台灣的自由主義運動除了《自由中國》時期外，都很重視「社會重分配」的論述，不過堅持經濟自由邏輯的仍大有人在，未來台灣知識份子在「經濟自由」與「經濟平等」（或「效率」與「公平」）之間如何取捨，將決定台灣自由主義的性格。至於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糾葛，在早期表現為「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孰重孰輕的論戰，在晚期則表現為台獨運動會不會傷害自由民主憲政的問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曾經對抗中國國族主義以國家為名對個人自由的侵犯，目前則必須防範台灣國族主義以人民為口號，動搖了憲政民主的基本原則。最後，後現代主義隨著自由開放時代的來臨，將價值多元主義的邏輯推到極致，倡導各種「顛覆」、「解放」的社會運動，迫使自由主義必須在價值普遍主義與價值相對主義之間做個抉擇，以防止憲政民主的理念和自由人權的保障淪為可有可無的選擇。江宜樺的分析立場無疑偏向自由主義，但是他相信自由主義在台灣代表的是一種中道的力量，值得繼續發揚光大。

相較於蔡英文與江宜樺的立場，曾國祥及許家豪強調保守主義也是一股不容忽視的意識形態與思想資源。他們的文章從公民意識的角度，討論台灣法治觀念的困境。他們認為法治議題之所以值得格外關注，是因為當前台灣雖然已經以「現代」的形式重建了政治系統與法律制度，並採行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但是一般公民所認知的「治理觀念」中，仍然缺乏一種嚴謹意義上的法治內涵。長期以來，台灣一直致力於憲政改革與經濟發展；換言之，一直致力於現代性的追求。然而，如果一個社會對於時代課題所做出的回應方式，必然根植於其本身的生活傳統，則台灣未來與現代世界的接合，仍將受制於某種「前現代公民意識」（pre-modern civil consciousness）。在此，曾國祥採用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觀點，認為「前現代」的特徵是「在

地性信任的絕對重要性」，而「現代」的關鍵性特徵則是：「根植於抽離化的抽象系統的信任關係」。

依據這個觀點，曾國祥及許家豪辨識出構成當前台灣「前現代公民意識」的三項基本特徵：儒家文化（Confucianism）、部落主義（tribalism）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儒學之所以具有「前現代」的性格，是因為儒家文化不願將道德與法律區分開來，並傾向以統治者的德行作為衡量公共事務的標準，而非訴諸於法律程序的抽象系統。其次，部落主義主要是表現在遍存於台灣城鄉的「派系政治」之中。作者選擇「部落主義」一詞來指稱這樣的政治現象，係著眼於台灣的派系政治恰恰是以「在地性的信任關係」為其運作基礎。最後，民族主義在台灣公民意識的形成上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因為台灣社會實際上同時受到了兩種「法治」思維的洗禮，除了（英美）自由主義之強調國家中立、權利至上、程序正當等要素的「法治」（rule of law）理念外，在政治實踐中也受到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觀念的左右。台灣目前的政治環境，比較接近德國法治國的初期發展，也就是社會上還保有一個偌大的空間，允許政治人物基於富國強兵的天職，選擇性地使用法治及其相關語彙，來修飾他們所更在意的「國族建構」或「國家統一」問題。

曾國祥與許家豪的文章詳細地討論了上述三種前現代公民意識的特徵，但是他們也強調文章的重點並不在於評估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的理論與實踐價值，而只是純然地將自由主義視為構成西方現代社會特徵的主流政治思潮，並假定這條傳統所揭櫫的許多信念，在過去百年來固已漸漸成為我們用以認識政治與法律的觀念依據，但是從一般公民意識形成的角度來看，呈現於知識菁英論述下的自由主義原理，似乎依舊無法深入民心，建構起一種足以取代儒家文化的公共語言典範。這或許也說明了如何以「實踐性的過去」來理解台灣的公民意識，仍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蕭高彥的文章，是以政治哲學的角度反思國家認同作為政治論述的主要特徵與基本型態，並嘗試分析臺灣當前國族論述的結構。他首先分析比較 Charles Taylor 與 Jürgen Habermas 兩位理論家有關文化社群與政治認同的論述，以及當代自由主義關於憲政共識的國家認同理論。於此基礎上，他進一步討論台灣當前兩個較有理論發展潛力的國家認同論述：江宜樺所提出的「以自由主義為基底的務實性國家認同論」以及林佳龍所主張的「公民民族主義」。他的憂慮是：由於台灣多階段修憲並未形成穩定政治秩序的架構，憲政體制無法作為國家認同的承載者，這構成了台灣政權轉移以後正當性危機的根源，可能必須尋求其他解決之道。

在國家認同的理論原型方面，蕭高彥認為Taylor主張文化社群乃形成政治領域的構成前提，政治認同應是文化認同之延續；而Habermas與政治自由主義者則主張政治生活的自主性，宣稱政治共同體的認同乃是憲政體制及公民政治活動所形成，不需要也不應當將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混淆。這兩種不同的取向相當接近於德國史家Friedrich Meinecke最早提出的政治性民族主義與文化性民族主義之對立，前者以政治共同體為樞紐來創造公民的國家認同與民族情感；後者之要旨則在於確立文化社群之特殊性（例如其語言、傳統、或宗教信仰），並以此基礎來型塑民族國家之政治運動。儘管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乃理想型之對照，但它們指出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底層的兩條主要線索。大部分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在形成有關國家認同之論述時，均不免面對政治或文化優先的根本問題，是以當代有關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之論述大部分均未超越這個二元對立典範。

接著，在關於台灣國家認同的論述方面，蕭高彥討論了江宜樺以及林佳龍所提出的整合性國家認同論述。他認為如果我們從民主化與本土化之的雙重轉換過程來觀察，將可發現台灣的雙重轉換仍未能克服關於「國民」想像的歧義，而產生了兩種觀念上的混淆。一方面，

本土化被先驗地關聯於民主化，使得公民民族主義通過集體人格塑造的途徑實質上有著其自身所不願承認的文化性格；另一方面，對於國民集體政治活動之想像，也擺盪於全體國民作為制憲之主體以及公民參與民主過程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之間。當前台灣習於以修改憲政體制來解決政治問題的思考，某種程度上趨近於盧梭的激進民主論述，從而也凸顯了「立法者」的角色。但是蕭高彥認為，要在台灣建立常態化的公民國家認同，必須先將政治人物此種「立法家」之心態馴化，並將國民意志加以制度化。這是自由主義以及公民民族主義都必須預設，但在其思想系統內部卻無法直接解決的理論課題。他因此建議我們參考其他的思想史資源，而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在關於政治制度之締造與正當性之建立等議題上，似乎提供較為豐富的論述資源。

徐振國的文章關注工商團體與現代國家的關係，他所試圖探討的問題是：在中華民國國家建立的脈絡下，前現代的行會如何轉變成現代的商會？又如何轉變成後來的工商團體？基於此一問題意識，他首先分析傳統帝國體制下國家和行會的關係，接著討論現代商會的形成（特別著重它和現代主權國家結合過程中，所形成的意識形態和發展策略上的尖銳衝突），然後顯示國家和工商團體如何在新的意識形態或政策綱領下重新結合，並如何促進台灣的經濟發展。

徐振國的文章有許多歷史發展的敘述，但是就理論的意義而言，他試圖超越威權論（authoritarianism）和威權統合論（authoritarian corporatism），而歸諸政治學的國家理論或新國家理論（the theory of statism or neo-statism）。按過去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由Juan Linz開創的威權論和由Philippe Schmitter開創的威權統合論，一直居於主導的地位，被廣泛用來描述和解釋台灣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發展和政治經濟發展。徐振國認為它們都屬於橫向比較的架構，缺乏歷史的或縱向的脈動思考。相對於此，由Michael Mann和L. Weiss、J. Hobson

和許多其他學者所開創的國家理論，則是因應「將國家找回來」(Bring the State Back in)呼籲的新理論思潮，可以放在比較歷史的脈絡下，來呈現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徐振國認為，這種縱向脈絡(Longitudinal Context)的理論，對於具有自身歷史的中國和其他非西方國家，才能掌握得比較深切。

依據威權主義或威權統合主義理論的看法，一般都認為台灣的工商團體是國民黨控制的外圍組織，沒有其主體性和自發性。另外也認為政府和工商團體之間，充滿了派系恩侍的糾結和負面的政商勾結關係，並無正面的制度性意義。然而從國家論的觀點和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徐文認為國家和工商團體之間，具有非常重要的互動關係和制度性功能。在前現代的中國社會，政府便善於利用行會來管制市場經濟，因而給予行會廣泛的行政裁量。而行會力圖控制行業之外，亦透過寺廟的宗教和文化活動，和社會有密切之結合。國家和行會於是形成共生狀態，有互抑互利的關係。在明清時代，由於海洋貿易的發達，中國沿海地區出現了組織層次更高的行會，台灣的商郊便是其中一例。從甲午戰敗到國民黨統治台灣，行會的發展頗為錯綜複雜，然而就實際的政經條件而言，一直要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之後，特別是在確定出口擴張的政策之後，工商團體才逐漸獲得更寬闊的代表性和決策參與空間，成為台灣經濟發展中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

古允文與劉育廷的文章討論的是台灣民主化與社會福利支出之間的關係。民主化與社會福利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向來是許多學者爭辯的焦點。儘管有些西方福利學者的研究顯示民主化與社會福利支出有顯著的相關，但仍有許多實證研究與觀察提出不同的看法而質疑民主化對福利國家發展的影響力。在台灣，民主化的進程與國家福利的發展在時機上幾乎是同時的，這個現象引起福利學者對兩者關連性研究的興趣，不少人採用歷史研究法去分析，認為兩者之間有重要的關連性。但兩者之間是否真的存在顯著關係，卻必須以嚴謹的實證研究

加以探討。

一般而言，檢驗政府的福利責任通常可從福利政策、福利立法與福利預算等三個指標來著手，然而政策與立法經常徒具宣示意義，儘管有動人口號卻沒有實際資源的投入。而國家的預算不但是政策最具體的展現工具，並且是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因此福利預算指標最能作為檢驗政府對於社會福利的實際努力成果。不過，從社會福利學理觀點來看，國內福利預算夾雜著許多不具有社會福利意涵的支出，而使現行福利預算有虛胖現象。因此，為了檢驗政府實質投入福利的水準，古允文與劉育廷先對福利預算所包含的內容重新檢討，做了許多刪減。另外，他們也根據政治學者的研究，從民主的定義中找出一個可以測量台灣民主化程度的指標，將之轉換成量化的分數。他們接著透過統計分析，對其所關懷的核心問題獲得了初步的看法。

古允文與劉育廷的分析結果顯示，台灣的民主化的確可以有效解釋一九八〇年以來社會福利支出的擴張，但並非對所有的福利支出都有顯著的影響力。民主化在社會福利總支出與社會保險支出方面是支出擴張最顯著的解釋變項；在社會救助支出方面的解釋力雖能達到顯著，然而卻只是次要解釋變項，解釋力比較強的變項是前期支出；而對於福利服務支出、國民就業支出與醫療保健支出，民主化對這段期間的變化似乎缺乏解釋力。最後，此文對於研究資料的限制與方法論上的限制，也做了若干說明。

陳添枝的文章以兩岸貿易關係為主題，探討台灣與中國大陸加入WTO之後，兩岸經貿發展可能的變化。陳添枝認為，台灣與大陸在成為WTO會員之前，兩岸的貿易是雙邊關係下的產物，在此之後兩岸貿易必須受多邊體制的約束。在雙邊關係下，政治的考量對商業往來設下許多障礙，尤其以台灣方面為甚。台灣對大陸商品的進口設有「正面表列」的清單，但對來自其他國家的進口則貿易障礙已經很低；在大陸方面，對來自台灣的進口並沒有特別的限制，但大陸對外貿易的

整體障礙則相對較高。兩岸加入WTO以後，台灣必須取消「正面表列」的清單限制，而大陸也將大幅降低其貿易壁壘，這對兩岸貿易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陳添枝的文章共分七節，除緒論外，第二節探討兩岸在加入WTO後台灣自大陸進口的可能變化；第三節探討兩岸加入WTO後大陸自台灣進口的可能變化；第四節探討大陸內銷的開放對兩岸貿易的影響；第五節探討兩岸貿易摩擦的問題，以大陸最近頻頻發動的反傾銷案調查為討論重點；第六節探討兩岸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以及其對兩岸分工基本型態的影響；第七節則對加入WTO後兩岸貿易情勢的基調作一綜論，尤其針對消費性商品貿易的發展作一分析。

陳添枝的綜合看法是：迄今為止，兩岸的貿易都是以工業原料及零組件為主，消費性商品占貿易的比例甚低。換言之，兩岸貿易是兩岸生產分工的投影。在兩岸加入WTO以後，此一貿易結構可望有一些改變，但不會有巨幅的變動。台灣由於本身市場胃納有限，消費性商品不論如何增加，均無法與大陸為供應世界市場所從事的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料和零組件相比擬，因此兩岸貿易仍將維持以工業原料及中間財為主、消費性商品為副的結構，而且台灣將持續保有貿易順差的局面。

在討論中國大陸的現代國家結構方面，本書共收入六篇文章，分別是李強（討論「後全能主義」時期現代國家的建立）、顧肅（討論近來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毛壽龍（討論有效政府的邏輯）、卡貝斯坦（Jean-Pierre Cabestan）（討論中國的法治困境）、楊大利（討論中國的行政改革與反腐敗措施）、張樂因（討論中國在轉型到市場經濟過程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以下我們也對這些文章做簡單的摘述。

李強的文章關注的是從「全能主義」（或曰「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過渡到「後全能主義」階段，中國的國家結構所發生的變化